

蕭公權
文集

中国政治思想史

蕭公權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萧公权文集

中国政治思想史

萧公权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11

ISBN 7-80148-790-7

I. 中… II. 萧… III. 思想政治史

—中国 IV. 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756 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邮政编码: 100005

电话: 010-65270477

传真: 010-65270449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销售热线: 010-65512133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960 × 1 300 1/32

印张: 20.375 字数: 764 千

版次: 2005 年 11 月第一版 200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 001~5 000 定价: 5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出版说明

萧公权先生 1940 年代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部学术钜著，功力深厚，系统性强，当年在宣传爱国主义和抗日战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次再版，我们将作者的观点、撰写程序和整个构筑模式，绝大部分原本地奉献读者。

然而，此书因受时代限制，有些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用今天眼光检视甚不符合。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作者始终坚持大汉族主义。由于这种民族偏见，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的清代，竟在全书架构规划上不占应有的位置，这些仍须读者在阅读时注意。

本书第五编“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成熟时期”原版本缺文。

凡 例*

一、本书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以供各大学政治系学生参考之用；其西周以前之一段，因文献寡征，暂援孔子阙疑之例，不立专编叙述，只于孔孟诸章中随时附件。

二、本书体例以时代为经，以思想派别为纬，其取材以前人著作之具有理论价值者为主。影响较大之政论亦酌量述及，专对一时一地实际问题之政论则一概从略。

三、本书叙述各家思想，力守客观之态度。偶有论评，亦意在辨明其历史上之地位，非敢任意抑扬，臆断得失。

四、本书第五编，原稿沦陷，仍存其目，以明原委。

五、撰者学殖荒落，而本书属稿值抗战期中，参考图书又颇不便。匪特见闻未广，尤恐纰缪滋多。事先不及就教高明，尚希不吝随时赐正。

* 本书原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8 年版《萧公权全集》之四。——编者

增订版弁言

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初成于1940年的夏天，五年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三十余年来，中外学子读之，引之，莫不奉为经典巨著。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Mote)教授穷十余年之力移译此书，上卷已于去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印行，都778页。书出未久已为彼邦学者购买一空，纯学术性著作销售如此，洵不多见，同时也可知此书的历久不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萧先生在英译本前言中提到：“原书是在很不利的情况下完成的”。所谓“不利情况”指的是抗战时期，当时先生“漂泊西南”，“糊口四校”，在敌机轰炸的情况下完成著述的。这可说是萧先生的“抗战精神”——在极艰困的环境里完成“任务”。

但此书的成功不能只靠“抗战精神”，在抗战之前，萧先生早已具备著述的优异条件。我们读此书，但觉脉络通贯，内容丰富，行文洁美，议论公允，很难想像作者经营之苦心孤诣。中国政治思想史一题为西洋体裁，不见于传统的著作之林，故作者必须自辟蹊径。然若要开出康庄坦道，不入歧途，则必须于西洋政治思想史著作有所涉猎，以及于政治思想一概念有明确的认识。萧先生早年留美，先后在密苏里大学与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都以政治哲学为专业，且从名师游。当时密苏里大学哲学教授赛宾(George H. Sabine)虽尚无赫赫之名，但后来于1937年完成《西洋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一书，名噪一时，而三年之后萧先生也完成《中国政治思想史》，师弟东西辉映，而二书皆成经典之作，可称美谈。萧先生在康乃尔的博士论文则是讨论近代西洋政治思潮的专著，题目是《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于1927年在伦敦出版，并列入“当代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方法丛书”，复又经牛津大学指定为“近代名著”(Modern Greats)，当代政治学大师拉斯基(Harold J. Laski)推誉此书之“学力与魔力均极雄浑，为政治学界五年来所仅见”。萧先生以中国

学者精研西方政治思潮,获得西方第一流学者之敬重,可知他对这一门学问造诣之深。

萧先生以此一深邃的造诣,回国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同时以所学来整理中国政治思想史,并开课授徒。具备治学的观点与方法之后,整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资料的搜集与选择。但搜集与选择的工作并不容易。在搜集工作方面,资料虽多,但散在群籍,非有明锐的观察力与极大的耐心与劳力,难获全豹。有些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之所以挂一漏万,即因此故。至于在选择工作方面,有二重困难,一为甄别政治思想史料,不与其他思想史料相混,此有赖于对“政治思想”这一概念能确实地掌握,譬如铺轨驾车,才有所准则。二为有些作者排列史料,上下几千年,无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种文献,少加分辨,于是犹如迷航,不知所至。而萧先生于战前在清华授课时,已将中国政治思想史资料作系统的整理,充分地搜集,严格地选择,曾辑有《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线装6册,作为授课的讲义,同时亦奠定了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萧先生运用他的政治学观点,历史的方法,在艰苦的后方——成都完成此一70余万字的巨著。

三十余年来,此巨著之嘉惠学子毋庸赘言。以此书中某些章节为基础撰成专著者,亦大有人在。今后必有更多的学子因读此书而得益,谨略举书中精彩之处,以供读者参考。

(一) 全书于政治思想的范畴内,上自文献可征之晚周,下迄辛亥革命,作极有系统的叙述与分析。二千五百余年中,凡可述之政治思想靡有遗漏,而所述论的详略则视创获性与影响力之大小而定,故通篇完备而匀称。读者读毕此书,可于我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及其演变,有一通贯全局之认识。

(二) 全书论及古来学者六十余人,皆就原作取精用宏,就政治学观点分类征引,并加以综合与分析,不仅使作者之政论“畅所欲言”,而且使其意义更加明晰。萧先生夹叙夹议,何者为古人所说,何者为近人之说,何者为萧先生之评论皆交代得十分清楚,读者一目了然。再者,各章之后(现改为脚注——编者)注释详明,或考订正伪,或另加解说,或标明出处,尤便于有心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三) 全书既采历史的方法,故对思想的时代背景特为留意。思想虽有其永久性,但政治思想必有时间性。所谓时间性乃指思想在某一时间里的出现或实施。政治思想除理论一面外,尤有其实践的一面,故不知历史背景不能了解政治思想。从整体看,全书是在一演进的历史间架上发展,自“创造”而“因袭”,由“因袭”而“转变”,再由“转变”而“成熟”。即从各个时期去了解政治思想的史之发展。再从某一时期看,因环境稍变,思想亦略有异同。例

如孔孟主张略同而途径有异，即因历史时代之故。萧先生说：“二子之异，殆亦时代使然。盖晚周养士尊贤，肇于魏之西河而盛于齐之稷下，二者孔子皆不及见，而孔子德位兼全之理想君子既无由实现，孟子乃承战国之风，发为以德抗位之说，亦极自然之事也。”又如论墨学之衰灭亦极精辟：“墨家衰亡之最大原因，似在乎环境之改变，而墨徒不能修改师说以适应之。嬴氏统一封建易为郡县。诸侯尽灭，皇帝独尊。销天下兵器以为钟镓金人。如是则尚同非攻之说无所用矣……墨家政治思想本针对晚周之历史背景而产生，其不能昌明于一统之专制天下，诚势所必至。至于思想内容之优劣，乃另一问题。”其他佳例尚多，自不必一一列举。

(四) 全书之中对臆说的批驳以及新见的提出也甚可观。自晚清以来，国人每喜作比附之谈，如以孟子具近代民主思想，以墨家有民选制度，以秦政为法制。此书莫不一一据实据理驳之，以正视听。萧先生平生治学素以平实谨严为尚，一边于捕风捉影之厥词痛加挞伐，一边律己甚严，无确切的事实与理由不立新说，但每立一新说常是难移之定论。例如，从孔、墨的比较以显示二者实有相似之处。萧先生说：“述古学以自辟宗风，立治道以拯时弊。游行诸国，终无所售，乃广授门徒，冀其能行道而传学。凡此皆孔墨之所同也。其相异者一仕一不仕，一由少贱而自跻于士大夫，一则终身以贱人自处……吾人以为就大体言之，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墨学乃平民化之孔学。”修正了孔墨不同道的旧说。又如对两宋功利思想的发挥，亦为前人所不及。萧先生说：“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不在理学，而在与理学相反抗之功利思想。”然功利思想与理学同为“儒家思想之巨变”，亦时势所致然。两宋功利思想以王安石为中坚，安石自是儒家的有为者，而不能以法家目之，本书的第十四章论之甚详。晚近浅学之徒复有以安石为法家者，未久不攻自破，而萧氏之说终不可移。

本书初由上海商务出版，因时局动荡，未尝签有任何契约。1949年萧先生移讲台湾大学，曾允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重印，但也未订版权契约，此后先生迁居美国，未再加以过问，而此书在台二十余年来一再重印，字体已模糊难认。今由萧公权先生交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用五号字体重新排印，并参阅英译本上卷校对，另增印“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为附录。附录之后增编“引用书目”，以便读者。本书完成四十年之后，以新面目与读者见面，并列于萧公权先生全集的第四册。

弟子 汪荣祖敬撰

1980年5月

目 录

增订版弁言	1
绪论	1
第一编 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创造时期	11
第一章 先秦政治思想之流派	13
第一节 历史背景	13
第二节 地理分布	19
第三节 交互影响	28
第四节 时代先后	29
第二章 孔子	33
第一节 孔子之身世及时代	33
第二节 从周与正名	38
第三节 仁	41
第四节 德礼政刑	43
第五节 君子	46
第六节 大同小康与三世	50
第三章 孟子与荀子	56
第一节 孟荀之身世及时代	56
第二节 民为贵	58
第三节 定于一	65
第四节 一治一乱	68
第五节 礼	70
第六节 治法与治人	74
第七节 天人之分	79
第四章 墨子	82

第一节	墨子之身世及时代	82
第二节	兼爱交利	87
第三节	尚同	91
第四节	天志明鬼	94
第五节	尚贤	97
第六节	节用	100
第七节	非攻	103
第五章	老子与庄子	107
第一节	老庄之身世及时代	107
第二节	反者道之动	111
第三节	无为而无不为	114
第四节	齐物外生	118
第五节	在宥	120
第六章	管子	126
第一节	管子之身世及时代	126
第二节	尊君与顺民	127
第三节	以法治国	132
第四节	经俗	138
第五节	经产	141
第六节	经臣	144
第七章	商子与韩子	146
第一节	商韩之身世及时代	146
第二节	势	151
第三节	农战	156
第四节	法	158
第五节	术	163
第二编	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因袭时期	171
第八章	秦汉之墨与法	173
第一节	墨学之消沉	173
第二节	李斯	176
第三节	法家思想之余波	181
第四节	法儒之争胜与合流	184
第九章	贾谊至仲长统	190

第一节	儒学之复兴	190
第二节	贾谊	192
第三节	董仲舒	196
第四节	董子以后之天人论	204
第五节	桓谭至仲长统	212
第十章	《吕氏春秋》至王充《论衡》	219
第一节	道家与杂家	219
第二节	汉代之黄老	220
第三节	《吕氏春秋》	222
第四节	《淮南鸿烈》	227
第五节	王充《论衡》	232
第十一章	王弼至葛洪	240
第一节	魏晋老庄思想之背景及渊源	240
第二节	无为	242
第三节	无君	247
第四节	列子	251
第五节	葛洪	256
第六节	佛教所引起之争论	260
第十二章	韩愈柳宗元林慎思	266
第一节	唐代儒学之复盛	266
第二节	韩愈	269
第三节	柳宗元	271
第四节	林慎思	275
第十三章	唐朝五代道家之政论	278
第一节	唐代道教之尊崇	278
第二节	元结	279
第三节	无能子	281
第四节	罗隐	286
第五节	谭峭	289
第十四章	两宋之功利思想	295
第一节	宋代思想之大势	295
第二节	李觏	298
第三节	王安石	302
第四节	陈亮	307

第五节	叶适	311
第十五章	元祐党人及理学家之政论	316
第一节	司马光	316
第二节	苏洵苏轼及苏辙	318
第三节	邵雍	326
第四节	二程与朱陆	331
第五节	《忠经》	338
第三编	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转变时期(上)	341
第十六章	明代专制思想之反动与余波	343
第一节	刘基	343
第二节	方孝孺	348
第三节	张居正	358
第四节	吕坤	364
第十七章	王守仁与李贽	369
第一节	王守仁	369
第二节	李贽	376
第三节	西学之初来与失败	386
第十八章	明末清初之反专制思想	390
第一节	专制之覆辙	390
第二节	黄宗羲	392
第三节	唐甄	400
第四节	顾炎武	404
第十九章	王夫之	412
第一节	制度论	412
第二节	民族思想	419
第三节	吕留良与曾静	423
第二十章	太平天国	430
第一节	政治思想之消沉	430
第二节	太平天国政治思想之背景	436
第三节	太平天国之政治理想	439
第四编	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转变时期(下)	447
第二十一章	戊戌维新	449

第一节	戊戌维新之历史背景	449
第二节	康有为之政治哲学	453
第三节	大同之理想	458
第四节	康有为之维新论	466
第五节	谭嗣同	477
第二十二章	梁启超	483
第一节	身世与学术	483
第二节	世界大同与民族国家	487
第三节	民权与君宪	492
第四节	民治理论	501
第五节	进步思想	511
第二十三章	戊戌前后之维新思想	516
第一节	冯桂芬	516
第二节	张之洞	520
第三节	何启与胡礼垣	528
第四节	严复	535
第二十四章	辛亥革命	551
第一节	革命运动之勃兴	551
第二节	邹容《革命军》	553
第三节	同盟会时代之革命思想	555
第四节	章炳麟	559
第五编	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成熟时期	583
第二十五章	孙中山(本编缺文)	585
附录		586
	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辑要凡例	586
	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	588
引用书目		629

绪 论

(一) 中国政治思想史之起点

吾国历史，世推悠久。溯其远源，可至四千年以上。然研究政治思想史者，不能不断自晚周为始。此实势有必然，非敢数典忘祖。三代以前，社会浅演，书契无征，固不待论。即夏商之世，文物制度尚在草创之中，学术思想殆亦方见萌芽，未能具体。况文献不足，记载阙失，纵有学说，已难考见。孔子生春秋之时已叹二礼无征。^{〔1〕} 洪范九畴虽或为夏禹政治之大法，而文辞简短。《商书》虽多为信史，而记载疏略。^{〔2〕} 至于殷墟甲骨贞卜契券之文字，虽可据以推想古代之制度，^{〔3〕} 而究非学术思想之纪录。凡此皆历史家与考古家之重要资料，而就政治学之观点论，殊觉其鲜裨实用。故吾人今日欲取中国政治思想作较有系统之研究，至早只能以周代为起点。盖吾国古代文化至周而盛。吾人虽不必从夏曾佑之说，谓“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4〕}，然学术思想之为周人所创，则为至明显之事实。

周代学术之大兴，不在西周盛世，而在东迁以后之春秋末叶与战国时代。^{〔5〕} 政治思想亦于此时突然发展，盖自孔子以师儒立教，诸子之学继之以起。“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6〕}，持故成理之政治学说乃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吾人今日虽不能依据史实确断其骤盛之原因，然就当时历史环境之大

〔1〕《论语·八佾第三》。

〔2〕王国维《古史新证》认《商书》除“汤誓”外皆真，《周书》“洪范”可疑。

〔3〕参周传儒《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

〔4〕《中国古代史》页29，孔子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谓“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是不以周为新创。

〔5〕平王元年迁都洛邑（前770）。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平王四十九年，前722），终于哀公十四年（前481），战国时代之起迄尚无定说，姑以春秋终止以后，始皇统一以前之259年当之，即敬王四十年至始皇二十六年（前480～前221）。

〔6〕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诗教上”。

势,与乎文化进步之通则,尚可作大致不差之推论。政治思想兴于晚周之主因有二:简言之,即社会组织之迅速变迁,与伟大思想家之适生其会而已。周室自平王之末,已趋微弱。诸侯强大,“秦、晋、齐、楚代兴”〔1〕,遂酿成春秋之局势。封建制度既就崩溃,贵族之社会组织与生活亦同时发生变化。士族与庶人间之界限逐渐消失,〔2〕贵族原有从政掌学之特权亦普及于平民。〔3〕史家所谓王官失守者,殆非虚构。且列国并存,相争雄长。同文壹教之术犹未用世。思想自由,学无拘禁。处士得以横议,“邪说”亦可大行。而国君图强,每重才士。魏之文侯(前445~前396),田齐之稷下,〔4〕尤为战国时代之著例。当此“天下无道”(语见《论语》),社会蜕化之际,不仅争乱频仍,民生困苦,而旧日所以维系人心保持秩序之风俗制度皆动摇崩坏,失其原有之效用。深思远虑之士,对此巨变之原因与影响,自不免加以疑问批评,而提出抗议或补救之方。政治思想,于是勃兴。上述种种情形,春秋已见其端,至战国而更甚。〔5〕故思想之发展亦至战国而始极。然社会环境仅为思想萌芽之条件。苟无天资卓绝之思想家如孔、孟、庄、韩诸人适生此特殊之环境中,何能造成吾国学术史上此重要之“黄金时代”。故政治思想起于晚周,由于千载一时之机会。而吾人即以此时期为研究之起点,诚亦有其自然之理由也。〔6〕

〔1〕《国语·郑语》。《史记》卷四“周本纪”亦有同样之记载。

〔2〕如《左传·昭公三年》载晋国“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又如宁戚饭牛而见用于齐桓公,百里奚贫贱而事秦穆公。

〔3〕孔子“有教无类”以诗书六艺授人,首开学术普及之风。

〔4〕魏文侯立于周贞定王二十四年(前445),齐威王立稷下官,设禄招士,当在其即位之初(前356)。宣王时(前319~前301)稷下复盛,达“数百千人”(《史记·田齐世家》)，“喜议政事”(《新序》),至湣王时(前300~前284)乃解散。

〔5〕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条谓“春秋时犹敬重礼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此述春秋战国之变颇为明晰。刘向的《战国策·序》亦谓“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损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王侯,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仿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绝矣。”可见周末社会之大概。

〔6〕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及《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二篇一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一章二节,均论先秦学术之起因,可参阅。

(二) 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分期——按思想演变之大势

西人论吾国文化者每谓其偏于守旧。学者遂或疑吾国之政治思想亦历久顿滞，古今不变。其实中国政论变化之剧烈迅速，虽未足与欧洲相比，〔1〕然吾人略加探索，即知其确经显著之重要变化，且可循其变化起伏之迹，而将此二千余年之思想史分为下列之四大段落：

一、创造时期 自孔子降生(前551)至始皇统一(前221)为时约三百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战国时代，学者通称之为先秦时代。

二、因袭时期 自秦汉至宋元(前221~1367)为时约一千六百年。

三、转变时期 自明初至清末(1368~1898)为时约五百年。

四、成熟时期 自三民主义之成立以迄于今。(三民主义之讲演在民国十三年。其最初完成则在孙中山先生伦敦被难以后居英之两年中，即1896与1898之间)

先秦为创造时期，其事显明，无待赘说。然孔子自谓“述而不作”〔2〕，门人复称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3〕。墨子“用夏政”〔4〕，而其言每兼称尧、舜、禹、汤、文、武。〔5〕道法二家，推尊黄帝。法家立言，且或以诸国刑书为依据。〔6〕是诸子之学，悉有渊源，非尽出心裁，凭空立说。创造之名疑有未妥。吾人请释之曰：创造者非无中生有之谓。春秋以前之人既有政治生活，岂无政治观念？古籍如诗书所载天命民本，礼乐兵刑诸说皆经先秦各家所采用，而成为中国政治思想中之要旨。然此等旧说，原来既乏系统，含义亦较简单。必分别经先秦大家之发挥董理，然后斐然成章，蕴蓄深远，进为一家之学说。此融旧铸新之工作，实无愧于创造。譬如工师建屋，木石砖瓦皆仰给于成品，固无碍于堂构一新也。复次，《汉书·艺文志》有诸子出于王官之说。〔7〕孔子从周，其教人之诗书六艺于诸子中殆最近官学。故章学诚谓

〔1〕 作者所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第一节中略论中西政治思想之异同，可参阅。(见本书附录)

〔2〕 《论语·述而第七》。

〔3〕 《中庸》三十章。

〔4〕 《淮南子·要略》。

〔5〕 汪中《述学·墨子后序》。

〔6〕 《晋书·艺文志》谓“律文起自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中略)商君受之以相秦。”

〔7〕 诸子学说来源，此后于分述各家时当略论之，兹不赘及。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1〕，“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2〕。以此类推，则先秦政治思想已具体于春秋战国之前，儒、墨、道、法之学乃因袭而非创造。〔3〕此论虽能成理，然不必与吾人之说相悖。请以儒家明之。孔子之政治思想虽以成王周公之制度为根据，然非墨守成规，举先王之政以为后生之教。必于旧政之中，发明新义而自成一家之言，然后七十子乃心悦诚服，奉为宗师。若其仅传周公之政典，“符节吻合”，毫无损益，则诗书六艺，当时既为官书，文武方策之政未经秦火，周鲁所藏，得观者岂仅孔子？〔4〕《左传》所载春秋士夫言谈中能称引《诗》《书》之文者不乏其例，何以儒家之学必以孔子为宗乎？吾人如谓孔子就文武之成规，加以自得之创造，而以之为设教立言之资，似较近情理而易通也。虽然，吾人认先秦时期为创造，尚有一最重要之理由，为上文所未道及而应注意者，则无论诸子学说之来源如何，其本身实“自我作古”，开后学之宗派。秦汉以至宋元之政治思想虽不乏新意义、新内容，而其主要之观点与基本之原理，终不能完全越出先秦之范围。必俟明清海通以后，外学输入，然后思想为之丕变。故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者，春秋以前可以存而不论，先秦时期则不能不认为全部工作之起点。其所占地位之重要，可以不言而喻。总之，先秦思想，对春秋以前为融旧铸新，对秦汉以后为开宗立范，创造之名，由此而立，或不至于大误。

先秦之创造，不由凭空杜撰。秦汉以迄宋元之为因袭，亦非悉出模仿，步趋古学，而绝无进展与改易。始皇并吞六国，封建之天下一变而为郡县，创二千年专制一统之政体。社会之环境既殊，则先秦百家竞起，各创新学之盛况，自亦难于继续维持。同时正以环境不同之故，秦汉以后之思想家虽因袭前人之观念与名词，而政治之对象既已迥异，则其所持观念之内容，与所用名词之含义，亦势不能与古人悉合。故严格言之，秦汉以后之政治思想不必有变古之名，而每有变古之实。吾人以此期之思想远不如先秦之富于创造精神，而思想家亦多无意于创造，因以“因袭”称之，非谓此千六百年之政论悉守晚周之旧也。抑吾人更须注意，先秦诸子，各立门户，辩生末学，相攻尤烈。如孟

〔1〕《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

〔2〕同书卷二“原道上”。

〔3〕例如江璩《读子卮言》卷二页28谓“墨子之学出于史佚。（中略）史佚有书二篇，汉志列于墨家之首，且谓周臣在成康时，则由史佚历数百岁而后至墨子。未有墨子之前已有墨家之学。”

〔4〕《左传·昭公二年》，载晋韩宣子观书于太史氏，谓“周礼尽在鲁矣”。